



姜义华


口述历史

姜义华口述
熊月之撰稿



ORAL HISTORY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口述历史丛书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姜义华口述历史/姜义华口述;熊月之撰稿. —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10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ISBN 978-7-5458-1147-6
I. ①姜… II. ①姜… ②熊… III. ①姜义华—回忆录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7938号

责任编辑 王 璇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姜义华口述历史(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姜义华 口述 熊月之 撰稿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50 000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147-6/K.196
定 价 40.00 元

编撰说明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由毛泽东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由历任市长共延聘近1200名馆员。馆员专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造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之士。他们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和丰富阅历,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原则:

一、丛书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外人士为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丛书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经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概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谈对象。征得同意后,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影像的基础上整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三、丛书注重口述历史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录”的独特性。访谈范围涉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尤其重视本人在场或参与之所历、所见、所闻、所传、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文字资料的内容。

四、丛书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偏差，其内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释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表等相关资料。

五、丛书在整理成稿并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因涉及敏感暂不公开，或不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给口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间。

六、丛书按照以图辅文、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征集和选用图片，包括照片、书信、手稿、字画、实物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基本要求是：图片题材应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图片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能丰富读者对历史的认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错，不吝批评指正，以利于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6月

目 录

编撰说明 …… 1

第一章 青春重锤 …… 1

一、学生时代的两次闯祸 …… 3

二、“反面教员” …… 28

三、宇宙一微尘 …… 35

四、又作“池鱼”及平反 …… 41

第二章 追求信史 …… 45

一、从事学术研究缘起 …… 47

二、在资料室工作 …… 55

三、参与《日本军国主义史》与《沙俄侵华史》编写 …… 58

四、注释章太炎著作 …… 61

五、推动文化史研究 …… 65

六、史学理论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 …… 72

第三章	一得之愚	85
	一、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	87
	二、组建复旦大学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研究中心	90
	三、为改革开放继续鼓与呼	93
	四、参与海峡两岸多方位交流	99
	五、为复旦发展出力	104
第四章	师恩友善	111
	一、复旦老师	113
	二、萧克	132
	三、校外师友	136
第五章	故乡与亲人	145
	一、故乡扬州	147
	二、两个母亲	151
	三、贤内助	155
	姜义华教授学术活动年表	165
	后记	187

第一章 青春重锤

一、学生时代的两次闯祸

一张大字报的风波

我于1957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那年十八岁。1957年复旦历史系招生数是一百人。因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一大批调干生进来。从1953年开始,凡是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的正式职工,经组织上调派学习,或经本人申请组织批准离职报考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均称调干生。我们那个班的调干生特别多。还有一些原先学俄语的也转到这里来。一百个学生没有分班,一道上课。到毕业时只有八十多个学生了,有些走了,有些去世了,有些是因为身体不好。调干生大部分是读到毕业的。调干生上学的条件主要是出身好、表现好、领导信任,至于其文化基础是不重要的。后来我们学校、系里的不少领导干部,包括年级学生会、系学生会、校学生会的干部,都出自我们班上的调干生。我们班留在系里的,一个是近代史的王知常,一个是古代史的樊树志,是作为教师留下来的,留下来的做政治工作的叫朱剑良、鲍怀崇、尤垂坝,他们原来是校、系学生会主席及年级党支部副书记。历史地理研究室留下来做资料工作的是郑宝恒。还有读研究生的许道勋、赵克尧。

从1957年到1962年,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是很不寻常的时期。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然后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那一届学生,一进来就遇到反右斗争。那时,高潮虽然已经过去,但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历史系是重点。我进校时,王造时、陈仁炳、张荫桐等教授已经是右派,被打倒了。学生中右派不少。这个斗争过去以后,上课还是比较正常的。大跃进运动起来以后,教学工作就受到严重影响。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学生到工厂劳

动,我们是到大中华橡胶厂;二是在学校里,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三是学生编书。所以,五八年上课就比较少。有一段时间,基本不上课,偏激地认为不要讲中国史、世界史了,只要讲毛泽东论中国史、马恩列斯论中国就够了。到了五九年,恢复了一段时间,六〇年以后,上课就比较正常了。

大跃进时,大炼钢铁,我们都参加的。在大中华橡胶厂劳动了好几个月,学生全部都下工厂。我们基本上做辅助工,跟着工人打下手,有一部分是做轮胎,三班倒。大中华橡胶厂在衡山路,上海唱片厂旁边,现在已经拆除了,现在那里是徐家汇绿地。大炼钢铁最高潮时期,我们又到中山西路那边,烧水泥,一大筐,一大筐,大概三百斤重的石头,抬上去,把它烧成水泥。烧出来的水泥,即土水泥,能用吗?说不上。我们是那里的主要劳动力。到那里去的,有我一个,赵克尧一个,许道勋一个。我们几个在水泥厂,整天都在抬大筐。那段时间,我们还被抽出来,即在水泥厂下班后,到徐汇区政府大炼钢铁。就在区政府院子里,造了一个小高炉。那地方在徐汇中学旁边,也就是原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旁边,现在已经没有了。那时,我们对徐家汇非常熟,因为我们宿舍就在宛平路上。我们在那里差不多半年时间,是指导员和我们一道去的。

我们那时都是满腔热血,上面的安排,大家都去做。问题是,那样烧出来的是不是钢铁?我们也弄不清楚。那时,上上下下,全国到处热火朝天。在复旦大学,学校要造物理大楼,我们就去当小工。那是六〇年。我们的工作拌水泥,拌三合土,一包一包水泥,一筐一筐黄沙,和石子一起倒下去,拌!每天都干这活。最冷的时候,在那里干,打赤膊,穿一个大背心。我们的速度甚至超过机器,超过搅拌机搅拌的速度。所以,物理楼的建造,有我们很多的汗水。物理楼现在还在,就是一进校门正对着的那幢楼。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大家都满腔热情,积极性非常高。那段时间,包括我自己,都热衷于乌托邦,特别忘我。

我9月份进校时,反右斗争已进入中后期了,但学校还在整风,在继续

反右,我们新进来的同学,也要参加。我们班上,有很多调干生,他们热情很高,每天都贴很多大字报,就贴在老校门进来那地方,即国权路前面的那个老校门,两边全部都贴满了。

我一进学校,老的同学就介绍,我们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最高的老师是陈守实先生。所以,我一进学校就到他家里去,看望他。那时候陈守实先生对我说,你们学历史的,第一要在理论上下功夫,首先要读《资本论》。陈守老是和王亚南先生一道研究《资本论》的,他不是食古不化,而是深入了解原理用以分析中国历史。他借鉴《资本论》的体系研究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很有成就,形成整套自己的见解,自己的体系。按照陈守实先生的指点,我进学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借了两本书,一本是《资本论》,另一本是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择》。当时,我就在读这两本书。那些大字报也在看,但觉得意义不大,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我们一个寝室的同学(一直就是这些人,到专业分开以后才分开的),有王知常、王学庄,还有其他一些人。王知常在我的床上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不是开玩笑,是正式的,因为那时候走廊里、宿舍里全都贴满大字报。我就说:“哎呀,我觉得你们那些大字报贴的没有意思,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为什么那些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关于国家大事的基本问题,你们不去思考?”那时,我是中学毕业后直接考入大学的,不像那些调干生有那么丰富的社会经验。王知常说:“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有一些问题倒是值得好好研究的。他说“你写”,我说“我不写”。他说:“你写个稿子出来,我给你抄。”所以,我的那张大字报,是王知常抄的。那张大字报后来就闯了大祸。

1957年10月9日,王知常把那张大字报贴在校门口一进来的地方。一贴出去,就有高年级的学生说,现在还有这么大胆的人出来!因为大字报批评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其中最关键问题是针对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的,针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认为我们对赫鲁晓夫的态度是一种妥协,还涉及国内问题,包括党的工作、国务院

的工作、财政赤字等等。大字报的题目叫《我的意见》，一共提了十条，其中针对党的工作的有两条，针对政府工作有八条，有将近三千字。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一、对党的工作的一些意见：

1. 党在处理国际主义运动时，似有某些缩手缩脚、明哲保身、关门建设的痕迹。

例一：苏共二十次党代大会上修正主义思想抬头，赫鲁晓夫等耍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我党中央对此二者皆有异议，但一直未大胆地与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与表示自己的意见。

例二：叛徒铁托、卡德尔的演说和他们的民族沙文主义以及修正主义影响很大，但“论”和“再论”中的批判，却有些过于婉转与迁就，仿佛顾虑得很。

例三：意大利共产党将通过议会长入社会主义的方针写进党章，我党却一声不响。

例四：今年六月底苏共中央作出开除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出党中央决议时，我党竟未对这件事正确与否发表意见，而说对其表现出来的团结表示满意，愿意进一步加强中苏友好（大意）。

……

2. “八大”提出党要加强理论工作，时已一年了，理论研究仍不活跃，有待加强。而尤有几个问题，应该加强理论研究工作：

(1) 苏共二十次党代大会的评价问题：……

(2) 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议会手段长入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批判。

(3) 关于斯大林的理论、活动的系统评述。

(4) 国家和农业社之间经济、政治关系如何？——这一点明确起来，许多政策措施在执行中可免差错或歪曲。

(5) 党史研究——还有三年多时间就是建党四十周年了。……应大力活跃理论工作。应该由我们的主席、副主席、总书记带头动起来。……

二、对于国家的一些政策措施的意见：

1. 希望彻底贯彻宪法中所规定的省(市、自治区)、县(自治州、自治县)、乡(自治乡)三级行政机构制度,撤销专区或其他派出机关,精简机构,放手让干部下放。……

2. 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某种程度地忽视了农业方面自然灾害的威胁,而未充分估计到人民社会主义积极性与工业发展之潜力,结果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任务提前完成了,去年工业战线也提出“四年完成五年计划”口号,而且很响,但后来由于农业跟工业发展比例不相称,使得粮食、食油、棉布供应不能正常,时松时紧。第二个五年计划应增加农业投资比例与对农业的注意力,加强计划性。

3. 经过这次大辩论,农业社可大大巩固……可能农业机械化高潮要到来得早些,希望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充分估计到这一点,加强发展农业机械制造工业,免得临时手忙脚乱。

4. 从急速把农民引入社会主义道路、防止农民更大地向两极分化与农民本身社会主义觉悟、合作化要求来看农业合作化速度是正常的,并未冒进。但高潮过去后,未继续对此加以最大注意力、尽最大力量来巩固,因而出现了干部、统购统销方面的一些问题。尤其反右斗争开始前一段时期,农村资本主义思想嚣张。

……

5. 粮食问题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各地因地因时条件不同,各有参差。国务院应注意这点,可由各省、市、县、乡根据本地情况决定。……

6. 国务院应对去年财政出现赤字一事作深刻检查,吸取教训,

引以为戒。这不仅是计划性问题，而且关系着国家经济状况的稳定与否及国力充实与否。

7. 党和国家考虑，是否可以订出这样一个制度：国家各级领导人（最高元首除外）分别在一定时期内解除职务，深入基层工作，或半年，或一年，或两年，再回中央或省里担任原职，换一批下去。这有几个好处：

(1) 可以真切联系群众、了解群众、指导群众，彻底克服三大主义，免得一段时间后三大主义又蠢动起来；

(2) 可以锻炼和培养更多干部，挑选人才，搞好工作；

(3) 具有更巨大意义的是，这是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异、消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脱节、消灭阶级和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

8. 教育部、高教部考虑：是否可以把每年暑假大中小學生参加一定时间农业劳动确定成制度。

这些文字都是原话，我保留了这份大字报的底稿。大字报贴出以后，引来一场暴风雨。一直到学校的登辉堂，都是铺天盖地的反驳的大字报。1957年10月份，学校在登辉堂开了辩论大会，都是组织好的，批驳我，对大字报的内容逐条进行反驳，都是高年级的学生上来批判，一边倒，也不让我发言。这是我到学校以后的第一场暴风雨。

当时有人提出，按照这样的言论，姜义华完全可以划为右派了。后来听说，一年级新生不划右派。据说内部有这一条。有人担心，姜义华你这个意见比那些右派言论厉害多了，系里那些右派的意见，不过是针对党支部、党小组的，并没有像你这么直接针对国家大政方针的。

五七年这场风波，对我震动很大。我们这些从中学直接考进大学的，比较天真，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知道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就想用这些东西来分析、评价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那时候，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波匈事件以后，我虽然是刚从中学出来，就在思考，总觉得中央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比较软弱。中学生的思维，比较简单，以为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不会想到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问题是那么复杂。后来六〇、六一年以后，中苏两党分歧明朗化，系里领导肯定了我当年大字报的基本倾向，认为我敢于讲真话，危机算是暂时过去。

一次小组会上的发言

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全国处于狂热状态。我们也都是狂热者，上面号召干的所有事情，我们都干的，包括除四害、打麻雀。消灭蚊虫的方法是，吃好晚饭，就到学校四周的稻田里，挥舞面盆，面盆里涂了肥皂水，里面就能落满蚊虫，一堆一堆全是蚊子。为了灭苍蝇，就到所有粪坑旁边去挖蛆。那时候不会嫌什么脏啊、臭啊的。灭老鼠没有什么实际活动，我们这里老鼠比较少。

我们当时确实狂热。真正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是在六〇年。我们到崇明去围垦。那年冬天，最冷的时候，冰天雪地。那时候水最小，学校组织我们在海滩搭帐篷，下面铺一点芦苇。那时候，粮食已经开始紧张了。几个月前，我们在造物理楼的时候，我们同学有的一顿可以吃一斤多粮食。我一顿饭基本上控制在4两，劳动最重的时候，也没有多吃。我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原来我的粮食定量是33斤嘛，后来困难的时候，就降到31斤。我是自觉自愿减少的，降到31斤，保证一天一斤粮，中午、晚上各4两，早晨2两。到崇明围垦劳动的时候，那个劳动多重啊，消耗特别大。围垦，就是把圩田外面的、芦苇滩上的泥，挖上来，挑到圩堤上来，堆上去，让江水进不来了，就变成了农场。那时候，我的主要工作是挑泥。我那个担子从来都是用长锹挖下去，一块就得七八十斤，一头一块，两头一百五六十斤，就这样挑。那个地，就是现在的湿地，海水、潮水刚下去，湿漉漉地踩下去，不是硬地，没法踩，就放一点芦苇在上面，踩上去不会陷下去。那时候，粮食已经非常紧张了，吃不饱。后来，大家就挖芦根，旁边都是芦苇嘛，用芦根来填

填肚子。那时候搞大跃进，提的口号是“大办”这样、“大办”那样。我最近看《毛泽东年谱》，发现最先提出“大办”的，就是上海。六一年以后，农村的同学、全国各地的同学回来以后，谈到农村的情况，感到了粮食已经非常紧张。

那些年我很少回老家，寒暑假基本上在学校看书。寒假暑假是最好的读书时间嘛，可以集中精力看书。我的阅读量非常大，学校所有的与我们学科有关的书，能看的我都看了。一个学期，我要换上好多本借书证。图书馆的老师知道我喜欢看书，会主动告诉我，这些天又来了什么新书。

对于那个时期的困难情况，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六一年底六二年初，有两次。一次是我自己回去的，到了镇江，到了扬州，到了南京，亲眼看到饥饿情况。在镇江的路上，看到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突然倒下去了，倒下以后，口吐绿浆，因为吃的是野菜、树叶。扬州也有不少人饿死。南京那样一个城市，也是这样。我在火车站，亲眼看到，一个人在吃烧饼，另外一个人突然抢过去，两口一咬。你打他也没有用。有一次我和董进泉到他无锡的老家去，到农村去看。那里山清水秀，就在太湖边上，那么好的地方，原来山上全是树，大炼钢铁时，把那么好的树全砍掉了。那些地方，原来没什么自然灾害，江南鱼米之乡，为什么也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当然，苏南饿死人的情况，比起外省来，还是要轻得多。我们一个来自河南郑州的同学，海文正，也是后来所谓历史系“反党集团”成员之一，他谈到信阳地区饿死人事件，饿死那么多人，而饿死人的信息，中央竟没办法知道，等到知道以后，那么多人都已经死了。

我是从全国各地回来的同学那里知道这种情况的。大学是全国信息汇聚交流的地方。安徽包产到户以及饿死人的情况，主要是同学们带回来的。我们这才知道全国饿死很多人。知道很多地方饿死的人不是一点点。我们才知道饿死人的不是信阳地区一个地方，几乎大跃进跑到前面的，当时在报纸上亮相最多的，河南、安徽、山东、四川、甘肃，这些地方饿死人都相当严重。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个大的问题：这是为什么？那段时

间议论最多的，就是这些问题。这段历史是我们亲身经历的，自己也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投入过，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我们同学当中，对此讨论很多。我说，我们做近现代历史的，对自己亲身经历过历史，如果都没有办法作出一点判断，那还成什么历史？画鬼容易画人难。近现代史是我们自身亲历的历史，就是画人啊。如果你对这段亲身经历的历史都没有办法画，你画那些鬼，你说你画得很像，谁知道呢？六二年，即将毕业，我觉得我们应当认真地、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做一点总结，做一点分析，做一点概括，这对自己也是一个反省。

当时，讨论比较多的是我们几个人，我、王学庄、董进泉与海文正。王学庄是从南京考来的，跟我是一个寝室的，董进泉是从无锡考来的，学亚非史的，那时已经分成几个专业了。海文正原来和我不熟悉，后来他谈河南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些接触。

1958年，毛泽东让人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那些文件与书，我们都狂热地相信。这时候，我们关心、讨论的问题之一，是怎么看中国的农民问题。这与我们在大学读书期间一直受陈守实先生影响有关。陈先生是研究中国土地关系史的，我的听课笔记到现在还一直留着。陈守实讲土地关系史，我听了他一部分课，因为与我们近现代史其他课程冲突，没能全部听下来。但是，我抄录了许道勋的全部听课笔记。陈守实先生所有的报告，我都去听了。

我当时就考虑中国的农民问题，这几年我们在农民问题上，究竟哪些地方做得对，哪些地方有失误？六二年我们在写毕业论文，我的毕业论文是《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政治思想》，王学庄的毕业论文是《石达开安庆改制》。在王学庄关于石达开安庆改制那篇文章中，我给他加了几段话，就是，杨秀清、洪秀全搞天朝田亩制度，要在南京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小天堂，但实践证明，它没有办法推广开来，没有办法延续下来，所以就有了石达开的改制，退回到按亩收租赋，实际上这是退回到现实所许可的范围。在中国那样一个小